

#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3年6月16日第B4版)

## 大风雪

1970年春天，冬草场的雪消融殆尽。我们用完了在草垅垅里搜集到的最后的残雪，就迁移到北部夏草场。转场必须在春羔大量降生前完成，否则会困难重重。接完了春羊羔，天气渐渐转暖，大羊开始脱去厚毛。很快草会返青，野花会开遍原野，草原上最浪漫的季节就要来到了。

蒙古高原的气候变幻莫测，五月底也会突降寒流。早上醒来，听到国旗拍打包顶的声音有如万马奔腾。我披上羔皮袍出门查看，天空开始飘雪，东边百米外，牛群已经在大风中站立起来蠢蠢欲动。夏日微风拂面，牛吃草时会迎风行走。冬天寒风凌厉，牛群会排着队甩着尾巴，不吃不喝顺风日行上百里。我急忙返回蒙古包，看到女主人已经烧好了奶茶。我简单喝上几口，吃一把炒米，就出门骑上骆驼追赶涌动的牛群。

我们在夏天秋天都会骑马出行，冬天马掉膘快，我们常常换乘骆驼。大队给我的骆驼高大威武，棕色的毛发厚密，宽大额头下的一双大眼睛带着迷人的长睫毛，非常漂亮。它是我冬天的挚友，当时还没有放回骆驼群。我和骆驼堵住了牛群南行的路，把它们顶风向北赶。我们的蒙古包在河滩南面，河滩北几里外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南坡比较背风，牛群到那里比较安全。

牛群顶风走的时候，会低头吃草，缓慢移动。寒风凛冽，飞雪无情地抛向它们的头脸，有机会它们就会掉过头顺风跑。我牵着骆驼堵在牛群后头，狂风吹起指甲盖大小的石子，横扫过来，脸被打得生疼。我不时抹去雪片在脸颊上化成的冰水。

雪越下越大，雪花伴随着呼啸的北风漫天飞舞，搅得天地一色，这就是所谓的“白毛风”。我好像被如来的大钵紧紧地扣住，二十米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身在何处。

终于把牛群赶到了山梁下，我牵着骆驼堵在下风头。地上的雪被风刮成一道道变幻移动的白条，和天上的雪搅在一起上下翻飞。头顶上如来的钵不断缩小，天地的压迫让人感到窒息，能见度不到十米了，我已经看不到完整的牛群。凛冽的北风吹透了羔皮袍子，穿透了身体，真正体会到了寒风刺骨。牛群安静吃草时我让骆驼侧卧卧倒，我紧靠着它坐到雪地上，让它小山丘一样的身体帮我挡住狂暴的风雪，借助它的体温让它们不至于冻僵。牛群骚动的时候，我会跳起身把它们喝住。

雪不停地下着。冬天的雪落在身上会被风吹散，春天的雪落到身上，化成水又结成冰。牛脊背两侧覆盖着冰的盔甲，牛头上冰和雪混杂下露出的两个眼洞让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鬼怪骷髅。我袍子上落下的雪化了又冻硬了，身体一动嚓嚓作响。早上的一把炒米

已经消化殆尽，人像掉进了深深的冰窟里。

一头小牛犊在寒风中倒地，我扑上去把它抱起来，它不站起来活动就只有死亡。一头母牛侧倒在冰冻的雪地上四肢抽搐，我使劲摇它，拍打它，帮它重新站起来。它不站起来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一整天我只遇见一个蒙古牧民骑马在风雪中穿行，焦急地寻找他的牛群。我的牛群在身边，62头牛都活着，让我感到心安。

白毛风继续肆虐。估计时辰差不多了，我按原计划顺风赶牛群回家。下了山梁，穿过草地，越过河滩，想着应该离家不远了，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蒙古包。这时雪忽然停了，天空放晴，在夕阳的照耀下我看到我们雪白的蒙古包已经远远地落在我们的左后方。下午风向的变化让我们偏离了回程的方向。

回到哈拉巴拉家，单腿跪坐在地毡上，冻硬的蒙古袍下摆像圆铁桶一样在身边竖立着，像欧洲贵族小姐的舞裙。我终于可以喝口热茶，暖暖冻僵的手脚。烤烤湿冷的鞋袜。知青邹云年在我们家，看到他和哈拉巴拉异样的眼神，猜想他们曾经为我的安危担心焦虑过，看到我回家时的状态，内心充满心疼。没有人问我一天的经历，灾难过去，人畜平安回来就是幸事。

那场春天的暴风雪给巴彦塔拉的畜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新生的羊羔和脱了毛的大羊大批死亡。随风吹跑的牛马不计其数。队里不少牛倌，马倌开始了跋涉数百里的漫长找寻，而并不是所有的牲畜都可以找回来的。我没有蒙古牧民认牛的好眼力，让我从别的牛群里找出自己丢失的牛不是易事。笨人笨办法，老老实实跟住它们才是万全之策。我是幸运的。

大风雪中赛因拉玛放牛的女儿乌兰其其格走失了，全队万分焦急。两天后才把她找到，还好人无大碍。

## 和贫下中牧“相结合”

1969年林彪一号令下达以后，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中苏，中蒙关系紧张，边疆地区实行了军管。我们公社也来了军管组，除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领导，还有几个年轻战士。他们好像对我们知青做过调查和甄别，知道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

一次我和林敬碰到一个军管组的小战士，一路骑马同行。他和我们年龄相仿，说知道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希望我们向孙荷新学习，真正和贫下中牧相结合。我谈定地说了一句：“我的家庭成分是高级职员。”他一脸认真地回复我：“我们查了，那个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范畴”这个大词出于一个稚嫩的小战士之口，倒让我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他提到我们的家庭出身让我感到不舒服，但是没有必要辩解。说到向孙荷新学习却让人感到更不舒服，和小战士的谈话就此打住。

孙荷新和林可同校，比我低一届，比我大两岁。

女附中的学生里高干、高知和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女比较多，文革前受的是理想化，教条化，精英化的教育。学生相对来说不谙世事，清高，但是普遍地做事比较认真执着。

孙荷新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是她当工人的母亲抱养的独女。母亲工资不高，竭尽全力节衣缩食满足女儿的经济需求。她下包住到贫牧老布僧家负责放牛。

老布僧是个老小孩儿，对什么都不满意，在任何会上牢骚最多，批判最猛烈。他老婆有间歇性精神病，医生出诊后我会每天给她打针，所以我和他们家比较熟悉，也会见到孙荷新。

老布僧有三个孩子，老大谢利布矮小精干，是个马倌。他是直肠子烈性子，常在会议中突然向人发难。但是每次牧民聚会时，他那清澈嘹亮的嗓音唱起蒙古歌来悠扬动听，颇受大家喜爱。

孙荷新1969年夏回北京探亲期间谢利布结婚了。孙荷新回到内蒙后感到失落，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谢利布知道了这份心思，用一首首动人的蒙古情歌唱开了她的心扉，发生了婚外情。这在蒙古人里不算什么，但是在知识青年中炸开了窝。孙荷新倍感难堪，很快嫁给了另一个牧民。

孙荷新的婚姻是幸福的。她嫁到了一个“阿吉勒台”的牧民家庭。他们一家组成一个浩特，公公放羊，小叔子放牛，婆婆和小姑子下夜，丈夫出去放马。一家里劳力多经济上就宽裕，她被全家捧着，吃穿不愁，成了知青里的上等人。

我们尊重别人的人生选择，但是自己如何和牧民相结合，真不是一个小兵娃子可以指点的。

曾经有蒙古大嫂希望我嫁给牧民，长期留在草原，我用几句不着调的玩笑话给搪塞过去。我收到过军马场战士写的情书，也装着从没看见。我不能预测风云变幻，也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不打算在不清楚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自己的择偶标准之前做任何选择和决定。

孙荷新也很不幸。她是最后留在草原上的知青，被照顾到锡林浩特市就业。在有了三个孩子以后，由于丈夫酗酒等家庭问题而离婚。她1970年回北京生第一个孩子时我在北京探亲，去她家看望。她母亲患严重高血压，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她而推迟退休。母亲伺候她月子时过于劳累，不久就去世了。孙荷新中年时中风，北京的家没有了，她回京看病时林敬给了她很多帮助。

在动荡的年月里我们中断了学业，从都市被抛到边疆，没有人生经验，面临种种艰辛，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就留下了种种遗憾。我们可以努力修补过去的疮疤，但是人生的旅途只有单程车票，有些东西是不可失而复得的。